



〔苏〕伊万·聂罗切夫 著

袁振武 译

审判员

出版社



审 判 员

〔苏〕伊万·聂罗切夫 著

袁振武 译

法 律 出 版 社

审 判 员

〔苏〕伊万·聂罗切夫 著
袁振武 译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57,000字

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8,000

书号10004·022 定价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审判员》是苏联作家伊万·聂罗切夫的小说集。作品以真实案例为基础，描绘和叙述了人民审判员库尔斯基成功的办案实践。同时也多方面地展示了苏联的社会概貌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..... | (1) |
| 二、“最幸福的是……” | (38) |
| 三、美，不该是那样的..... | (46) |
| 四、谁之罪..... | (78) |
| 五、女占卦者..... | (118) |
| 六、小福特的未婚妻..... | (138) |
| 七、缪斯..... | (193) |
| 八、“请正确理解我……” | (209) |

•

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

他们有点异样、甚至有点奇特地面面相觑，绝不象战前市里法官们在工作中（业务会议）或者在家里碰头时那样轻松自如。这也毫不奇怪，时间不饶人呀，而且这是一段特殊的、紧张的时间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平添了皱纹，头发也已斑白，许多人还佩戴着勋章和奖章。这些昨天的战士，几乎有一半还没来得及脱下军装，换上普通衣服（来不及或者是不愿改变四年的习惯）……大概是由于东道主库尔斯基接待客人时穿的是普通衣服，也没有挂勋章。

来的人不多——八个人，而他们一起上前线的亲密同志是二十一人。多么惨重的损失！

宴席并不丰盛。遗憾的是，在多年的别离之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总谈不起话来。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·库尔斯基决定改变这种局面。

“是呀，朋友们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一个新的阶段正在来到……不过我们不去搞推测。让我们按照习惯行事——回忆一段战争年代里各自的经历。谁愿意先讲？”

退役的司法中校莫洛佐夫象一个小学生那样举起了手：

“请允许我来讲，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！”

“请吧，伊万·费奥多洛维奇！”

我要讲的事情是少有的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：被告有可能被判处死刑，而他拯救了那个掌握着他命运的人……他把一个法官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1942年秋天，在激烈的炮战中，步兵师法庭正在开庭审判。一个战士因临阵脱逃而受审，他不承认自己有罪。确实，他未经许可就擅自离队，探望家人（母亲和妻子），她们仍然滞留在前线附近的家里。当时，他的那个团奉调在离前线三公里的地方作短期休整。干吗不去探亲呢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他准备归队了，在干草棚里与年轻的妻子告别，但就在这时，他被拘捕了。

法庭承认侦讯的材料不足：没有讯问被告的妻子和母亲。法官们作出对该案进行补充侦查的决定。对于这一点，被告自然是不知道的，也不可能知道。他十分不安，心想自己生命难保，马上将会耻辱地死去。

响起了枪声。有人在近处向法庭成员开枪，毫无疑问，遇上了敌人。这是法西斯匪徒的侦察队。

法庭成员们拿起枪，纷纷爬向自然隐蔽物。战斗开始了，一个法官站起来，喊道：“为祖国，冲啊……”——敌人的一颗子弹立刻把他打死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被告捡起了死者的自动步枪，迅即消失在长满榛树丛的斜坡后面。他从那里向法西斯匪徒的侦察队开火，打得十分奏效。他几乎没有法庭成员们的帮助，就打退了敌人的袭击。法庭成员们损失了一个同志，法西斯匪徒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：死七人，被俘一人。

情况仍然十分危急，死亡的危险威胁着他们。敌人迫使我的一个团撤退，楔入了我方阵地，打开了一个很宽的缺

口。法庭成员们处于敌我双方火力的夹击之中，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。绕道，绕道，——似乎不停地绕道而行。在一次绕道中，法庭的卡车遭到射击，卡车歪到一旁，车轮被一枚子弹打穿了。过不多久，响起了呻吟声，但立刻又静寂了。一个同志迅速爬向法庭庭长。伤员失去了知觉，但转瞬间又苏醒过来，法庭书记员药箱里的阿莫尼亚水起了作用。不能再浪费时间了——浪费一分一秒也不行。更可怕的危险——被俘迫在眉睫。对于专门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，被俘真比死亡更可怕：法西斯匪徒在查明身份后，立刻将他们杀死，或者如果情况许可，先严刑拷打，然后加以杀害。

但他们又得救了，救他们的仍然是被告。正是他，身强力壮的被告，把伤员背出危险地带，送到了卫生营。

师检察长接到了法庭对该案作补充侦查的决定以后，撤回了起诉，而这位战士被呈请政府给予奖励，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的崇高奖赏，而以后又多次立功受奖。

快要轮到殷勤好客的东道主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·库尔斯基讲了。不过，大家请求他先发言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他战争年代的司法实践多么丰富多彩。库尔斯基欣然同意，但又马上预先声明说，他打算违反一点先前的规定，不谈战争年代的事。他将讲述他是如何进入司法界的，那时几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……

“一个女人的命运镌刻在我的心里……她好象名叫……克谢尼娅。她的姓我记得很清楚——托尔佐娃。对了，是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。”

“这件事让我来说吧！”市法院前审判员、现在是退役的司法上校阿尼西莫夫语气坚决地插话说。“我也……难道

能忘记吗，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？要知道，我曾对你和托尔佐娃之间的可疑关系作过调查，而且差一点断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司法人员的前途……”

“怎么会忘呢，弗拉基米尔·弗拉基米洛维奇，这样的事怎么会忘呢！我甚至记得，你变愤怒为宽恕。”

“我作一点修正：我否认有愤怒，承认有宽恕。”

“愤怒——是我顺口说说的，我确实没有感觉到你有愤怒。”

“你们要知道，我现在插进来说不是没有原因的：如果由我来讲亚历山大·伊万诺维奇想对我们讲的事，那将会更精彩，事情无疑是十分吸引人的，但东道主有可能讲得很平淡，——因为要讲的不仅仅是托尔佐娃……谁‘赞成’？好。大多数……”

“历来如此，”阿尼西莫夫开始说，“很难找到一个不想在自己职业的星空中超过最明亮的星辰的大学生。萨莎·库尔斯基正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，尽管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他绝没有料到，他的司法生涯是在一张破旧不堪的、几乎是三条腿的法庭书记员的小桌旁开始的，而且最初是在法官、甚至是在法庭老书记员的特别监视之下。”

……法庭大厅里挤满了人，在临时加放的小桌旁坐着书记员库尔斯基和三个女人——两个年轻的，一个上了年纪的。

响起了铃声。“开庭！”

审判长伊琳尼娜走了进来，与她一起进来的还有人民女

陪审员。

审判长对着大厅问：

“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到了吗？”

一个年轻女人从前面长凳上站了起来。她脸庞端庄秀丽，灰色的眼睛下面有两圈黑晕，头发没有梳理；她身段苗条，背略显佝偻，眼神里透着戒备。

原告人是区国民教育处处长科斯季诺娃。她对面坐着区助理检查员格拉戈烈娃，她身穿深棕色的西服，绸缎短衫，打着一条绿色领带。桌子边上挤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——区民警局少年管理室主任佩特丽谢娃。她们来法庭是为了保护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十二岁的女儿娜塔莎的。

区国民教育处对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提出两个起诉案：

1) 剥夺她当母亲的权利，2) 由于被告与孩子、父母、邻里不能居住在一起，她必须从寓所中迁出。两个起诉案将一个接一个分别进行审理。

法庭警告证人，其中包括克谢尼娅的母亲，如提供伪证，要追究责任，然后让他们退出大厅。法官宣布了法庭的组成人员，说明了各方在审判过程中的权利。

区国民教育处处长科斯季诺娃发言。她说得慷慨激昂。区国民教育处接到托尔佐夫一家不睦的报告。其实，不能说是一家。托尔佐夫老俩口——克谢尼娅的父母亲——早已与女儿分开，一个十八平方米的房间用板壁一分为二。娜塔莎理应与母亲住在一起，但她一直与外婆一起生活。克谢尼娅没有丈夫，是一个独身母亲。她不在任何地方工作，常喝酒，酒醉以后在家里、在外面寻衅闹事。她不尽扶养和教育女儿娜塔莎的义务，孩子全由外婆照管。为了使孩子免受母亲的

不良影响，应该在法律上把孩子判给外婆。

娜塔莎怎样对待这件事呢？

与孩子作过详细的交谈。她很爱母亲，不止一次地请求她母亲不要喝那害人的酒，不要把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回家来。那些人也喝酒，然后大吵大闹，有时还大打出手。现在女孩只好同意把外婆作为自己的“妈妈”。

科斯季诺娃代表区国民教育处请求剥夺被告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做母亲的权利，责成她付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给外婆，作为娜塔莎的抚养费，直到女孩成年为止。

“您有什么要说的吗，公民托尔佐娃？”伊琳尼娜冷冷地问，“您承认起诉的事实吗？”

克谢尼娅站起来，一只手搭在椅背上，想说什么，但只咽了一口唾液。

“法庭听您的陈述！”伊琳尼娜提高声音说。

托尔佐娃双脚交替站着，迟疑地说：

“能这样污蔑人……真是毫无廉耻！”

法官对托尔佐娃审视了一下：

“您这话当真吗？”

“我没有兴致开玩笑，法官公民。作为一个母亲，一个女人，我感到很痛苦。我的仇人想诽谤我，他们把自己装扮成诚实的证人和我孩子的保护人来到了这里。难道您自己看不到，不明白这一点吗？”

法官的脸色阴沉起来，匆忙地翻阅着厚厚的卷宗，读着民警局、房管局调解委员会的证言。她的耐心使行政机构和社团的所有代表们震惊。

法官没有把证言全部宣读——对被告酒后的丑行未作叙

述。她不断地提问：“怎么，这也是谎言？”“莫非这也是民警局捏造的？”“这里又是邻里们污蔑您，对您图报复吗？”

克谢尼娅老是挑衅性地看着法官，匆忙地接着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话，坚决地重复说：

“是的，是谎言，彻头彻尾的谎言！是的，是民警局捏造的，彻头彻尾的捏造……是的，泄私愤，报私仇，所有证人都是我的敌人，他们是在诬陷我！”

克谢尼娅在作什么打算呢？难道她不懂得，她的顽固态度，不作任何辩白的矢口抵赖会激起所有的人——审判员们、检察员、区国民教育处和民警局的代表、以及全体旁听者反对自己吗？诚恳地承认一切错误，保证去工作、诚实地劳动和教育好女儿，那会对她有利得多。

独身的母亲！这是个多么荒谬的词。看来，她也是个独身的女儿，——连老母亲也反对她。

伊琳尼娜的脸色比乌云更阴沉。她很少有这种情况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直到最后一刻即作出判决或决定之前，她总是不露声色的——这是一个法官的好品质。大家知道，不这样也不行，否则就“要求”回避。而这时她实在忍耐不住了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颗正直的心能忍受得住！伊琳尼娜时而转过头去，她不能看着被告，听她那厚颜无耻的谎言……

亚历山大·库尔斯基怜悯托尔佐娃。为什么？是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吗？他认为托尔佐娃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人。应当如此严厉地审判她吗？是什么环境迫使这个女人如此残忍地玷污自己呢？为什么审判员们、检察机关的代表、区国民教育处的代表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呢？难道办事一向十

分细致的伊琳尼娜没有感觉到，托尔佐娃只是某个不为人所知的环境的牺牲品吗？如果宣布休庭，他要与法官谈谈：应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内心世界，因为她面临着严重的危险：失去孩子和住处。

伊琳尼娜“啪”的一声合上卷宗，询问陪审员们是否还要向被告提什么问题。没有。检察员和民警局少年管理室的代表也没有再提什么问题。一切都十分清楚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呢？

母亲托尔佐娃从证人室里被传唤了进来。

“您是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的母亲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我真不幸……”

“公民托尔佐娃，请您详细讲述您家里发生的事。”

母亲的声音常常中断。她原来与丈夫生活得很好。家庭经济宽裕。丈夫是个技艺高超的红木匠，母亲料理家务，照管女儿。她十分喜欢女儿，怎么能不喜欢呢？独生女儿嘛。

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克秀莎^①成了母亲……这事怎么发生的呢？她说，她爱上了……她从此离群索居，回避父母。以后她把小娜塔莎交给了外婆，自己进了工厂。克谢尼娅的工作很轻松：当仓库保管员。那里常常是整天无人光顾的。根据一切情况判断，她工作得并不坏，大家对她表示满意。克谢尼娅原可以一直工作到现在；但是，四年前，她结识了一个女友。这个女友怂恿她抛弃工作，到黑海去，说什么求婚的男子象一段段圆木一样，躺在那里的海滨浴场上，可以任你去挑选。这个女人达到了目的：克谢尼娅抛弃了孩

① 克谢尼娅的小称。

子，丢了工作。

母亲悲痛的叙述，激动了库尔斯基的心。应当由于她向往普通的女性的幸福，寻求钟爱她的丈夫而谴责她吗？能不能简单地说：你应该把工作置于一切欲望之上呢？如果她有一个有趣的职业，在集体中工作，那就好了！……而她却孤单单地坐在仓库里，独往独来，形单影只，想着痛苦的往事。难道周围的人没有过错吗？他们原来应该引导她向另一面——好的方面转化。可是，他们没有这样做，当然，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……

整整六个月，克谢尼娅杳无音信，没有寄来过片言只语。父母等待着，担心她出了什么事。

但是，克谢尼娅回家来了，皮肤晒得黝黑，从头到脚象被烟熏黑了似的。她消瘦了，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。父母以为她变聪明了，愚蠢的念头已在暑热中消融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她变得更坏了。克谢尼娅没有回厂工作，一连几天不回家，常常到深夜，甚至凌晨才回家。邻里们开始议论，克谢尼娅常喝酒，结交了一批坏朋友。事实果真如此。过不多久，她不是一个人回家，而是带一些男人回来，变得爱寻衅闹事，满口脏话，甚至经常和人打架。

民警局工作人员，房管所调解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光顾他们的住处，他们花了大量时间，苦口婆心地规劝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小女孩与外婆住在一起，娜塔莎很懂事，知道得很多。于是诉讼案……

“是呀，你培养了一个坏女儿，坏女儿！”审判长伊琳尼娜的话里含有责备和怜悯。她皱着眉头问被告。“您说吧，也许，您的妈妈也在……撒谎吗？”

克谢尼娅垂下头，一声不吭。

检察员问道：

“证人托尔佐娃，请您讲实话，您现在对自己的女儿有什么想法呢？”

“我的想法……我能有什么想法呢？她是个坏女儿，也是个不中用的母亲。一句话——是个不可救药的……”

大厅里一片哗然。

“这是条毒蛇，不是女儿！”

“应该按照法律使这个畜生脱离孩子。”

“别闹了，公民们，你们妨碍工作了……检察员同志，您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有……证人托尔佐娃，您在哪里工作，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在食堂里，当清洁工……如果您问的是钱，那是够用的。我完全可以扶养娜塔莎……”

“扶养是一回事，而……教育又是另一回事……您没有教育好女儿。”

证人托尔佐娃害怕起来。她明白，关键时刻来到了，——必须维护自己扶养娜塔莎的权利。没有娜塔莎，她就无法生活下去。外孙女是个讨人喜爱的孩子，——这是她生活中剩下的唯一慰藉。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讲着自己的错误……对娜塔莎的教育则不同，可以问学校，民警局少年管理室的代表，问邻居——随便问什么人……

但是，检察机关的代表还不放心。格拉戈烈娃想什么呢？难道可以想象把娜塔莎从外婆手里夺过来，送进保育院吗？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。

又是由于年轻和缺乏诉讼程序的知识，库尔斯基过早地

急躁起来，不安地把椅子摇得吱吱作响。大厅里所有的人也都很激动。气氛越来越紧张。

“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证人……请问，托尔佐娃，要是法庭决定将女孩留在您身边，您怎么保证她免受母亲的不良影响呢？”

“怎么保证？……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……”

“可是必须回答，这是个重要问题，也许是主要问题。”

检察员是对的，应该绝对消除克谢尼娅对孩子十分有害的影响。

伊琳尼娜问科斯季诺娃和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，是否想作什么补充的陈述。科斯季诺娃简短地重复了一下自己的理由，克谢尼娅忧郁地沉默着：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她已经山穷水尽，大家当然不会相信她，有什么办法！

助理检察员格拉戈烈娃再次发言，她作为国家的代表，被要求对该案作权威性的总结。

“我同意区国民教育处的立场——这是以该案的全部材料为依据的：被告完全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。如果克谢尼娅·托尔佐娃象现在一样继续与娜塔莎保持联系，那么不幸就不可避免——女孩将会被毁，无庸讳言，她会走母亲的路。自然，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容许的。首先，从道德上讲，我们就没有权利这样做。法律允许我们坚决地、根本地改变娜塔莎的生活。我请求满足区国民教育处的起诉要求。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：判决扶养费是否适当？她不工作，哪有钱呢？不能这样说。审判员公民们，你们判决扶养费，就能迫使被告劳动，她应当，而且必须去工作，否则她的行为就被认为是蓄意拒付孩子的扶养费，她就得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

后果。而后果，你们知道，将是严重的——监狱！我劝告您，托尔佐娃，到某个建筑工地去，努力争得在我们城市生活的权利。”

检察员的结束语博得了一致的掌声。

审判员们走到会议室去了。

经过短暂协商后，审判员们走进大厅。伊琳尼娜宣布决定：起诉要求完全得到满足。

接着，法庭开始审理第二个诉讼案——关于迁居的起诉。它几乎已被第一个案件预先决定了：理由相同——被告恶劣的和不成体统的行为；证人也相同，但对他们提出警告和请他们退出法庭的手续重复了一遍，诉讼法规定这样做。

克谢尼娅象原先一样，仍然处于精神麻木状态，难道法庭的第一个决定对她的影响如此强烈吗？她是否感觉到这一决定对她的未来具有严重的危险性？永远失去孩子！只有当格拉戈烈娃对第二个诉讼案作总结，以不可动摇的论据坚决要求克谢尼娅迁居时，被告才浑身哆嗦了一下。克谢尼娅“腾”地从长凳上站起来：

“要我迁居？迁到哪里？”

“迁到街上！”格拉戈烈娃语气坚定地明确说。

“迁到街上？！我生在这里……我很爱自己的城市……”

“大家都热爱这可敬的城市，维护她的荣誉。而您的行为呢？请回过头来，看一看这些列宁格勒人的眼睛……不愿看吗？害怕了？羞愧了？在这个挤满了人的法庭上，在全列宁格勒城，在全国，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同情您。”

今天，听众使亚历山大喜欢，地方政权机构，包括检察机关的代表的积极性使他高兴……但他的心在隐隐作痛，他